



中華福音神學院

神學碩士科

論新巴比倫與新亞述王國時期
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學校教育

指導教授：胡維華 老師

學 生：邱琳雅 (T12104)

June 2015

—目錄—

一、前言	2
二、研究動機與方法	4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5
四、往昔學術成果	5
五、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學校教育	7
(一) 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學校教育	7
1. 學校教育之歷史與學校	7
2. 學校教育之目的、功能及地位	9
3. 老師與學生	10
(1) 學生與其家庭	10
(2) 老師	11
(3) 師生關係	11
4. 學校教職人員	12
5. 課程設置	12
(1) 教育階段暨課程安排	12
(2) 教學方法	14
6. 教學材料	15
(二) 學校與神廟	15
(三) 文士之出路	16
(四) 比較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地區與新巴比倫 及新亞述王國之學校教育	17
1. 課程內容之差異	17
2. 書寫材料之差異	18
3. 學校規模之變化	19
4. 受教育機會之普及	19
5. 學徒契約之產生	20
(五) 結論	20
七、參考書目	22

一、前言 (Preface)

1958年12月4至7日，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舉辦一場主題名為「古代近東地區城市化及文化發展」之研討會，會中邀請知名古代近東舊約學者 Benno Landsberger 針對主題「教育的文士概念」(Scribal Concept of Education) 發表演說。Landsberger 提及，在1949年，古代近東學者 Samuel N. Kramer 幾乎整全地還原了一份計有九十行、其名為「學校的日子」(Schooldays) 的蘇美泥板文本文獻¹。此份文獻的文本類型，充滿師生之間或學生們彼此之間的對話場景，提供了仔細、清楚的關乎古巴比倫王國時期學校教育內容之描述。對 Landsberger 而言，他甚至認為如欲更貼切的形容這些場景，可以說此些師生對話揭示了黃金時代中一個令人尊敬機構中之精神與道德。此亦即著名古代近東舊約學者 Oppenheim 之所以將之評價為「米索不達米亞奇蹟」(Mesopotamian Miracles) 的緣由，蓋其觀念及體制上之大量與豐富，就我們已可判讀之部分，早已遠遠領先與超出先前以及其後之歷史時期許多。當中頗有趣的是，前述師生間或學生間之對話，不僅是揭示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地區學校教育之輪廓，甚至很有趣地揭示了文士們的自我形象。此些對話均發生在蘇美文稱之為 Eduba 之場所，亦即所謂之「泥板屋」(tablet house)，而其成員不論年紀，均對外面世界以「泥板屋之子」(sons of tablet house) 自稱，成員彼此之間則以「同事」(Colleagues) 互稱。此外，泥板屋之教師稱為「父親」(the father)，其導師 (the preceptors) 稱為「年長的兄弟們」(older brothers)。在此時期的泥板屋可說是相當程度形塑了古代學校以及文士群體之集會，前述所謂的「兒子」(sons) 乃是當時階級制度裡的榮譽頭銜²。

在 Kramer 發表“Schooldays”的泥板文本後，已大略傳達出古代近東學校教育之生活型態資訊；爾後，學者 Miguel Civil 也在其名為“Edubba D”的文章裡，提供了吾人關於文士學習生活的一種詼諧洞察力³。此外，尚有許多出土的泥板等考古證據前仆後繼地顯示，文士在古代近東時期確實是屬於受到高等教育的一支菁英階級族群。在古城吾珥 (Ur)，考古隊曾挖掘出大量刻有楔形文字之泥板及石塊，其上的文字可以說是見證了吾珥居民超過二千年來的生活及思想。其中之文本特質種類多樣，包括行政文件、關乎神廟之詳細收支紀錄，其中亦包含部

¹ Samuel Noah Kramer, "Schooldays: A Sumerian Composition Relating to the Education of a Scrib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9: 4 (1949), 199-215.

² Benno Landsberger, "scribal concepts of education," in *City Invincible: A Symposium on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ed. Carl H. Kraeling & Robert McC. Ada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94-100.

³ Miguel Civil, "Sur les 'livres d'écolier' à l'époque paléo-babylonienne," in J.-M. Durand and J.-R. Kupper (eds.), *Miscellanea Babylonica: Mélanges offerts à Maurice Birot* (Paris: ERC, 1985), 67-78.

分王室銘文等。在此些吾珥的泥板與石塊中，學者們在其上發掘許多語彙上的、文學性的資料，語彙上的文本是字彙與詞組的清單，通常多按照主題排列，但有時也會按照用以書寫的符號、同義字或反義字在語義上之分類來排列，例如樹木以及木材物品清單（lists of trees and wooden objects）⁴即為其一。而前述之清單文本，其功能多設計來引導學生學習蘇美語言及寫作⁵。除此之外，由美國賓州博物館帶隊挖掘之另一大城尼普爾（Nippur），也發掘了較吾珥更大量豐富之文物，是最大宗及最重要的蘇美文學資料來源。學者 Steve Tinney 在研究吾珥及尼普爾之出土泥板與石塊後，在其文章中提及，十九世紀末葉的亞述學者及考古學家 Hermann Hilprecht 於探究尼普爾之泥板堆（tablet hill）後作了以下推論：「毫無疑問的，這一個由大型三角堆所佔據的區域裡，包含了神廟的圖書館，以及城市裡的學校。」亦即，顯然因著此些考古文物的出土，早期的語彙的、文學的文本與文士之學校教育的關聯性，因此受到廣泛認同，並成為一系列學界討論且盛行的主題⁶。

在類似泥板文物及石塊出土前，吾人對於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之文士受教育過程、狀態及未來就業方向，以至整體學校教育體系、學習過程，特別是師生互動關係、課程安排等，均一無所知。藉由觀察考古發掘泥板上所保留之學生練習紀錄，得以間接重建當年文士們受教育之練習過程，故而藉由此些為數頗豐之泥板、石塊等考古文物，加上古代近東學者專家們之研究探討，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學校教育制度、體系之面紗逐漸被揭開。

反觀舊約聖經，在各種人物當中有特別提及曾受或將受文士訓練者有如下幾節經文，例如使徒行傳七 22 說到：「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以斯拉記七 11~12：「祭司以斯拉是通達耶和華誠命和賜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祭司以斯拉通達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另在但以理書一 3~4 亦記載「王吩咐太監長亞施昆拿，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胄中帶進幾個人來，就是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足能侍立在王宮裡的，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從前述幾節經文中，吾人可知，儘管聖經上記載摩西在埃及習得一切之學問、以斯拉受過傳統文士教育並通曉一切律法、但以理及其他三位年輕人通達各樣學問並知識聰明兼備；然而舊約聖經亦未詳細記載此些人物接受學校教育之相關細節，不管是在古埃及、古以色列或古巴比倫，很明顯的關於學校教育過程、體制、生活等之相關記載均付之闕如。學者 Eric A.

⁴ 相關資料可參考 N. Veldhuise, *Elementary Education at Nippur: The Lists of Trees and Wooden Objects*, Ph.D. diss.(Netherlands:University of Groningen,1997).

⁵ Steve Tinney, "Texts, Tablets, and Teachings-Scribal Education in Nippur and Ur," *Expedition* 40:2 (1998), 40.

⁶ Tinney, "Texts, Tablets, and Teachings-Scribal Education in Nippur and Ur," 41.

Seibert 和 Michael Fishbane 均說到：「『很遺憾地，並沒有任何聖經資源述及古代以色列文士之訓練。』想當然爾，聖經紀錄中亦無明顯提及學校等資訊。因而在王國時期的猶大是否存在文士的學校確實存有大量爭議」⁷。

不論古代近東之米索不達米亞或是古代以色列，學校教育均對此二區塊甚是重要；米索不達米亞地區向來被稱作是古代近東文化之搖籃，筆者企盼透過本篇報告之研究彙整，稍微得以管窺此文化搖籃之核心面貌——學校教育。

二、 研究動機與方法 (Motivation and Methodology)

古代蘇美箴言如是說：「抄寫藝術乃講演者之母，係眾學者之父 (The Scribal art is the mother of speakers, the father of scholars.)」。此句蘇美箴言實在道出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地區對文士及學者們之高度敬重。儘管大部分的文士背景仍因缺乏紀錄而無從考察，然從米索不達米亞地區眾文士與學者們所產出之各種文本，確實可觀察出其等所受之訓練、所擔負之責任與義務，及其平常之活動。各式的文本紀錄程度不一地反映了關於文士的訓練、文士學術圈的存在，以及學術界楔形文字的本質⁸等等。文士實際上乃古代近東學校教育之接受教育主體，如能藉由各樣方式得出文士訓練、課程安排等相關資訊，亦等同或多或少地間接還原出古代近東學校教育之型態。

實際上，古代近東的學校教育一直以來總是引發學者們研究上廣泛的興趣，然而此類主題迄今依舊缺少更多更進深之研究，方能使古代近東學校教育方面之相關資訊趨於完整。在此研究領域內，有學者嘗試蒐集分析各式各樣銘文、碑文上之文本資料，以獲取關於古代近東世界及古代以色列在書寫及文學方面之資訊；也有學者嘗試調查考古證據，以獲取其文本資料之方式，來分析解讀學校教育相關資訊⁹；甚至在調查考古證據之技巧上，亦有學者採用所謂社會學上的模型 (A Socio-Archaeological Approach)¹⁰來解讀相關資料。然最大宗之研究成果仍屬乎一群針對關乎學校教育之文本資料進行文學性分析的學者群¹¹，此些學者針對例如蘇美的 Eduba 學校文本進行文學性分析，以獲取關乎古巴比倫王國時期之學校教育資訊，成果頗豐。雖然諸多學者針對此學校教育主題，各自採取前述所列不同之研究方法，企圖達到還原古代近東學校教育之型態，然而在此些不

⁷ Eric A. Seibert, *Subversive Scribes and the Solomonic Narrative-A Reading of 1 Kings 1-11* (London:T&T Clark,2006), 50-51.

⁸ Laurie E. Pearce, "The Scribes and Scholar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in *CANE* 4 (1995), 2265.

⁹ 參考 Christopher A. Rollston,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the World of Ancient Israel-Epigraphic Evidence from the Iron Age* (SBL Press, 2010).

¹⁰ 參考 David W. Jamieson-Drake, *Scribes and Schools in Monarchic Judah-A Socio-Archaeological Approach* (Almond, 1999).

¹¹ 參考 Konrad Volk, "Methoden altmesopotamischer Erziehung nach Quellen der altbabylonischen Zeit," *Saeculum* 47(1996), 178-216.

同研究方法中，確實仍各自有其限制以及優缺點，並無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得以全然重建古代近東學校教育的態樣，合先敘明。

在本份報告中，筆者將因循前述眾多學者所採行之研究方法，繼續就學校教育之文本資料（textual evidence）或考古資料（archaeological evidence）等進行相關分析，並彙整往昔學者之研究與意見，嘗試立於眾巨人肩膀更往前進深一步，企盼由論述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學校教育概觀開始，及至聚焦論述新巴比倫及新亞述王國二時期之學校教育，最終使此二時期之學校教育體系之變化軌跡更完整的呈現。

三、 研究範圍與限制（Scopes and Limits）

（一） 時點之限制

本篇報告所處理之學校教育主題，因其制度蓬勃發展之時點乃在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蘇美（Sumer），故而本篇報告將針對學校教育源起之古巴比倫王國早先時期首先闡述，最後始聚焦於新巴比倫及新亞述王國時期。

（二） 語言之限制

因本報告所處理之主題，其文本資料之判讀實際上涉及許多古代近東語言，礙於語言能力上之限制，筆者所閱讀之眾多文章乃係經歷學者專家詮釋並翻譯過後之資料，並無法引用第一手之楔形文本資料做為論述基礎，此係資料使用上之限制，合先說明。

（三） 研究材料之限制

本份報告主題採用之研究方法係針對各式泥板文本以及各種考古證據資料，並不包含除此之外類型之資料，此係引證資料來源上之限制。

（四） 資料詮釋之限制

本篇報告處理主題雖係學校教育體制，然體制內仍包含許多抽象之概念，如同「師生間之關係」之詮釋上確實容有解釋上之限制。蓋透過泥板文本內容之分析與觀察，卻期使抽象概念之「師生關係」趨於客觀，實不容易，畢竟個人觀察及詮釋角度不一，此係資料詮釋上之限制。

四、 往昔學術成果（Previous Scholarship）

關於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地區學校教育之討論，最早出現於 1949 年學者 N.S.Kramer 所撰“Schooldays”一文。Kramer 此文首先揭露兩河流域楔形文字之發明與發展，直接促使學校之產生，因而早在主前三千多年，即有教學之存在。繼之於 1953 年，學者 Adam Falkenstein 發表“die babylonische Schule”一文後，不

僅此份文章在學術上被引用最為頻繁，並且開啟爾後一連串學者進行相關研究。當時隨之跟進的許多亞述學學者，老一輩的如 J.J.A. van Dijk、C.J.Gadd、S.N.Kramer、B.Landsberger、F.R.Kraus，正值青壯年的如 A. Sjöberg、W.H.Ph. Römer、H.L.J.Vanstiphout、H.Waetzoldt、Th.J.H.Krispijn、M.Civil 以及 C.Wilcke 等人，均在此議題上投入程度不等之貢獻¹²。其中 A. Sjöberg 和 M.Civil 二位學者在此議題上也出產過重要論文¹³。

Falkenstein 之文章雖首先論述關於古近東學校教育之議題，然因為其在當代僅提出狹窄之資料基礎，以至於無法針對特別之爭議進行更仔細深入的闡述，例如教育之方法論。此外，他亦如同其他年輕學者一般，以學校課程與作業量為其主要研究範疇。實際上，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教育與培訓類之主題，迄今始終尚未成為全面性的、廣泛的研究。因而，學者 W. von Soden 在其 1985 年出版之著名論著 *Einführung in die Altorientalistik* 中論到，關乎教育之基本原則亦鮮為人知，蓋其中一些王室教育及文士培訓指南並非適用於所有教育型態¹⁴，H.Waetzoldt 亦採取前述相同看法。

在近期數十年中，關於古代近東學校教育之單冊論著，最早期有 1960 年學者 N. Veldhuis 所著之 *Elementary Education at Nippur: The Lists of Trees and Wooden Objects* 一書。此書採取較傳統之處理方法討論學校教育，並以檢驗泥板上語彙清單上之資料為主要方法論。然本書之處理方法稍嫌保守，無法涉略更多學校教育之課程內容等；且其處理範圍僅止於基礎學習階段，並且論述時間點僅限於古巴比倫王國時期，實為可惜。爾後在 2001 年，德國女性學者 Petra D. Gesche 深入探究主前一千年之巴比倫之學校教育課程內容，並撰寫成博士論文 *Schulunterricht in Babylonien im ersten Jahrtausend v. Chr.*，其論述之內容相當紮實，論據相當有力，受到同領域之研究者相當高之評價¹⁵。Gesche 是首位嘗試研究晚期巴比倫王國時期之學校泥板文本者，並且使用此些文本資料創設出文士教育課程設置之一新理論。其於論文中最重要之發現乃在於鑑定出不同學校教育階段所用之不同泥板類型¹⁶。

另外，在 2001 年英國二位專攻古代近東文化領域之女性學者 Karen Radner

¹² Volk, "Methoden altmesopotamischer Erziehung nach Quellen der altbabylonischen Zeit," 178–216.

¹³ A.W. Sjöberg, "The Old Babylonian Eduba," in *FS Th. Jacobson* (AS 20, 1975), 159-179. M.Civil, "Education in Mesopotamia," in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II* (New York, 1992), 301-305.

¹⁴ 學者 H. Waetzoldt 之研究中，亦產生與 Soden 類似前述情況。參 H. Waetzoldt, "Der Schreiber als Lehrer in Mesopotamien," in *Schreiber, Magister, Lehrer. Zur Geschichte und Funktion eines Berufsstandes. Schriftenreihe zum Bayerischen Schulmuseum Ichenhausen, Zweigmuseum des Bayerischen Nationalmuseums*, Bd.8, ed. by J.G. Prinz von Hohenzollern and M. Liedtke (Bad Heilbrunn, 1989), 33-50.

¹⁵ 參考 N. Veldhuis, "On the Curriculum of the Neo-Babylonian Schoo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3:3 (2003), 627-633.

¹⁶ A.R.George, "Rezensionen,"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50 (2003/2004), 403-406.

與 Eleanor Robson 合編一巨冊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neiform Culture*，專司討論關乎楔形文字之大小問題。該巨冊中邀請許多研究楔形文字之學者發表相關論文，其中數篇均論及古代近東之文士與學校教育，可說是討論鉅細彌遺，資料豐富。同年 Eleanor Robson 更發表一篇文章“*The Tablet House: A Scribal School in Old Babylonian Nippur*”，其專文由考古角度切入，首先論述建物之大小，繼之討論在建物內可能進行之所有學校課程內容，係頗具時新性之專文¹⁷。

五、 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學校教育 (Schooling in Mesopotamia)

(一) 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學校教育

1. 學校教育之歷史與學校 (History of Schooling / Eduba)

在一首榮耀舒爾吉王 (Šulgi of Ur) —約主前二千年一位統治者的讚美詩裡，此王以第一人稱來介紹自己的豐功偉業。讚美詩開頭處有一傳記體之安排。在其敘述完出生時所臨到他之命運後，舒爾吉繼續如下描述他的孩提時代：

「當我年輕時，我在學校裡學習，
泥板上蘇美和亞喀得的文士藝術。
在所有的出生高貴者間，
無人能像我一樣書寫。
人們往何處尋求文士藝術之指導，
在那我早已完全掌握減法、加法、微積分和會計。
公正的 Nanibgal Nisaba，
為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知識和理解力。
我是個一絲不苟的文士，不會錯過任何一件事！」¹⁸

由前述讚美詩的描述，吾人確可從中得知古代近東學校及學校教育之部分運作情況。

實際上，最早之學校教育乃發源於兩河流域之蘇美地區，時間點最早可回溯至主前第三千年，已如前述。現存最早之泥板文本資料即出土於古代之蘇美古

¹⁷ Eleanor Robson, “The Tablet House: A Scribal School in Old Babylonian Nippur,” in *Revue d’assyriologie et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93 (2001), 39-66.

¹⁸ Niek Veldhuis, “The Cuneiform Tablet as an Educational Tool,” *DS-NELL* 2:1 (1996), 11. 舒爾吉王讚美詩之英文譯文如後：

「When I was young I learned at school
the scribal art on the tablets of Sumer and Akkad.
Among the highborn no one could write like me.
Where people go for instruction in the scribal art
there I mastered completely subtraction, addition, calculating, and accounting.
The fair Nanibgal Nisaba
provided me lavishly with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I am a meticulous scribe who does not miss a thing!」

城烏魯克 (Uruk)，這些泥板文本資料主要係經濟和管理文獻，當中包含學生之單詞表，供學生學習時練習用，由此可知於主前第三千年時，文士們已經有學校教育之雛形了。此外，二十世紀初葉，法國考古學家曾在兩河流域上游之馬里 (Mari) 遺址發掘出一所屋舍，更被認定為現今世界上最早的學校，也因著此所屋舍鄰近皇宮，附近更建有泥板文本之儲存場所，因而考古學家推斷該屋舍乃係一所王宮舉辦之學校¹⁹。在兩河流域米索不達米亞地區，學校雛形雖然早已存在，然學校教育之盛行卻是介於主前 1900 年至主前 1500 年之間的古巴比倫王國時期。爾後，在所謂介於主前 1500 年至主前 1100 年米索不達米亞歷史中之「黑暗時期」，學校教育實際上亦未倖存下來²⁰。

針對兩河流域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學校教育存在與否之判斷，根據學者 Niek Veldhuis 之觀察，此判斷主要源自二類證據基礎，一類是來自前述泥板文字的文學文本 (literary texts)。此類型文本通常被稱為 Eduba 文集 (Eduba Compositions)，因為此類文集主題多涉及學校、學校教育或學校生活等之內容。文集當中儘管多數充滿挖苦或諷刺特質之內容，然而其中仍含有相當寶貴的學校教育資訊²¹。

除了文學文本外，第二類關乎學校知識的證據基礎係考古證據。各式各樣出土的練習泥板 (Exercise tablets)，使得學校教育的資訊曝光；蓋此些為數頗多之練習泥板乃學生直接由學校接受教育之明證，泥板乃教育之工具、媒介。出產此類練習泥板最大的城市乃是尼普爾城 (Nippur)，藉由觀察此類練習泥板，可得知學校教育課程之大略輪廓²²。而通常產生此類練習泥板之建築物即被解讀為「學校」(Eduba)。在古巴比倫時期，此類學校建築大多蓋於家庭區 (domestic areas)。它們並非紀念性建築物，甚至此類型建築物體積相當小，可容納人數不會超過十位學生，如一間可容納約四位學生之教室，或許就已算為大間²³。

綜上，吾人確知透過各式涉及學校生活之 Eduba 文本分析及各樣泥板上之證據資料，得以幫助吾人澄清及觀察古代近東之學校教育生活態樣、課程等在內之大致輪廓。

2. 學校教育之目的、功能及地位 (Purpose、Function and Status)

不論是根據泥板上之文學資料或考古證據，都較難直接探測出古代近東學

¹⁹ 李海峰，《古代近東文明》(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65。

²⁰ Karel Van Der Toorn, *Scribal Culture and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6.

²¹ Veldhuis, "The Cuneiform Tablet as an Educational Tool," 11.

²² Veldhuis, "The Cuneiform Tablet as an Educational Tool," 15.

²³ Veldhuis, "The Cuneiform Tablet as an Educational Tool," 13.

校教育之目的，然而 Veldhuis 在將古代近東學生所閱讀之文本與該學生成為文士後在職場所撰寫之文本相互對照之下，其觀察到一名文士所學的確實超出他應學的甚多。文士需要學習蘇美語言，以應付撰寫契約及商業文件之需求，然其於學校所學之大量蘇美語言多屬模糊或過時之語彙；加上時值亞喀得語(Akkadian)盛行之時，文士卻甚少注意亞喀得語之學習，反聚焦於蘇美語言之學習等現象。因而 Veldhuis 推斷「學校教育之目的」實際上係一種「文化資產之投資」(an investment in cultural capital)。他認為教育實質上是一種「區別」(distinction)。在前述提及蘇爾吉王(Šulgi)之讚美詩裡，就其對學校生活之描述，很明顯地吾人亦可觀察出文士確實認為自己之社會地位較眾多未受教育者高且更好²⁴。再者，根據考古學家對學校遺址之考察，蘇美之學校約莫有三類型，其一乃臨近王宮之學校，可能係宮廷或政府機關所設立；其二係位處神廟附近之學校，應由神廟所設立；最後一種係私立學校。由此觀察，吾人可知至少宮廷或神廟設立之學校所養成之文士，其教育目的頗為明顯，亦即在於為王室及神廟培養文士，以適應未來行政管理及經濟管理之需求，此宗旨及目標似乎貫穿著蘇美學校發展之始末²⁵。

除了前述職業能力訓練之目的外，在文化富饒之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其人民也將建立學校系統之目標放在「維護持久之文明」的角度上，蓋如果不吸取過去之智慧與經驗，任何文明均無法持久繁榮，如透過寫作與文學，卻得以將該地區過去之文明與現在之知識和成就連繫一起，並傳遞至將來。尤有甚者，從更寬廣之角度而言，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人民建立學校系統尚存有一更高目標，亦即在於「人性之培養」。儘管課程與教學範疇狹窄，然該地區之教育系統仍尋求反覆教導人民所謂之「人性」之抽象事物。「人性」首次在歷史上出現，即在蘇美涉及教育之泥板文本中，其中一份泥板曾提及「一名學生對其老師說，『我一直像小狗一般，直到您打開了吾雙眼。您在我體內製造了人性。』」另一份則說到一位沮喪之書寫者去信於其子，並說到「因為您並不尊重自己的人性，我的心都碎了。」透過對往昔經歷之尊重，對學習之敬畏，對自律之持久操練，服務他人勝過自我之根本信念，該地區人民追尋達到教育至高目標乃是透過「對人性情感與行為的培育」²⁶。

論及文士在社會上之功能，新一代聚焦古代近東研究之女性學者 Laurie E. Pearce 說到，文士所處之社會多數居民均屬未受教育之人，而文士在社會中之責任及義務是為此些未受教育之人及其他人撰寫文件，此亦是文士之所以學習讀寫

²⁴ Veldhuis, "The Cuneiform Tablet as an Educational Tool," 26.

²⁵ 李海峰，《古代近東文明》，65。

²⁶ 斯蒂芬·伯特曼，《探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461-462。

能力及計算能力之目的。當文士精通前述基本裝備後，文士便預備服務公立或私立之商界群體。如文士有興趣或天賦進行更進深之學習，將進一步獲取更廣知識，諸如科學、文學、宗教學等。想當然爾，最後此些學習進深知識之學者群毫無疑問將負起保存米索不達米亞之文化遺產責任²⁷。此外，文士及學者均屬於社會精英階級，如同一則蘇美語及亞喀得語之雙語箴言如此說到：「文士之技藝，接收可觀之報償，是明眼之守護者，宮廷之所需。」²⁸基本上，在學校裡之學生係以社會上層階級之男性學童為主，此些學童之父親多為富裕之商人、祭司、政府官員、外交大使、國王，偶爾也包含文士在內²⁹。在考古文物中有塊泥板即記載約主前 1750 年阿爾里馬 (Tell Al-Rimah) 文士 Yasitnaabum，前程似錦，有人喻之：「專心學習文士技藝，吾將使你成為紳宦家之主。」然而即使 Yasitnaabum 放棄食物與水，只為精通文士之技藝，卻因著無多餘金錢物資，因而始終與王廷無緣³⁰。

3. 老師與學生 (Students and Teachers)

(1) 學生與其家庭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教育並非全民教育，亦非義務教育。學生可能來自社會各階層，然而實際上出自富裕家庭之學童較有可能獲得機會入學，畢竟窮苦家庭出身之學童負擔不起學費以及學成需耗掉之大量時間。早期曾有一則諺語如此說到：「要想成為一個文士，必須每天和太陽一起升起」³¹。

此外，就學生家庭之觀察研究，學者們發現於許多考古泥板上之詞語的、宗教的以及文學的文本末端處有一連串名字之落款，供學生學習文士的名字、家系（父親之名及職業等）以及其師之名字³²。1946 年，德國亞述學學者暨楔形文字專家 Nikolaus Schneider (1884~1953) 根據前述資料編列文士之家系清單，因而發現此些文士（學校畢業生）之父親多為政府官員、市長、大使、神廟管理人員、軍事官員、海軍上尉、高級稅務官員、祭司、管理者、監督官、工頭、文士、檔案管理員、會計師等。前述文士父親之階層幾乎全數來自城裡之富裕階級；另值一提者係，此清單中未曾提及任何一位女文士，此係相當程度表示當代之文士

²⁷ Pearce, "The Scribes and Scholar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2265.

²⁸ 此則箴言英文譯文："The scribal Art, receiving a handsome fee, is a bright-eyed guardian, the need of the palace."

²⁹ Pearce, "The Scribes and Scholar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2265.

³⁰ Pearce, "The Scribes and Scholar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2265-66.

³¹ 李海峰，《古代近東文明》，66。

³² W.H. van Soldt, "Babylonian Lexical, Religious and Literary Texts and Scribal Education at Ugari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alphabetic literary texts," in *Ugarit – ein ostmediterranes Kulturzentrum im Alten Orient.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der Forschung. Band I: Ugarit und seine altorientalische Umwelt*, ed. M. Dietrich and O. Loretz (Münster, 1995), 180.

學校教育裡，僅收受男性學童之可能性極高³³；加以學生們通常在孩童時期即接受教育，即便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社會裡發現有女文士之蹤跡，然男學童仍為學校之主要成員³⁴。

(2) 老師 (Teachers)

基本上，在古巴比倫時期，許多的教育均以非常小之規模，在一個被稱為 Eduba 的場所裡進行的，此詞乃源自蘇美語，即「學校」之意，爾後在亞喀得文中被稱為 bīt-tuppi(m)，名為「泥板屋」。在此學校裡，由稱為烏米亞 (Ummia)³⁵之文士老師主持，通常「泥板屋」即屬老師自己所有之屋宇³⁶。有如木匠指導其學徒一般，此處的老師 (Ummia) 由初階開始引導其學生 (Pupil) 從文士的學校漸漸進入楔形文字書寫的神秘。此處之學生稱為 dumu-é-dub-ba -a，此字通常出現於經濟類形文本中，然在此處似乎是指在軍隊服務的文士。在所發掘的許多學生練習品的末尾，常會出現 dub-sar-tur 之落款，亦即小文士之意³⁷。

實際上，此處之老師均係不同領域之文士專家，其中可能包含教導數學之文士、勘測田地之文士及教導蘇美語言之文士。這些教師之薪資大概來源應係學生家長所付之學費。此外，有趣者係一則泥板上之蘇美教師收受家長賄賂之故事，其大意略為：「教師收受學生家長一份厚禮，包含精美戒指一枚，教師於家長面前讚美恭維其子，並表明將拔擢其成為班級領袖，望日後成為人中翹楚，然該名學生是否果不負眾望，顯然泥板並未記載³⁸」。

(3) 師生關係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學者 Cohen 和 Kedar 在古代近東之學校師生關係的研究上曾提到，雖然部分教導及教育的觀點得以被重建，例如學校教育裡之課程設置、訓練學徒之經濟上責任等，然而在學校教育系統始終仍存在許多未知之領域。例如學校建築真正外觀何如？師生或學徒之社會背景或經歷？是否有學生制式服裝之存在？是否存有學校之開業式或結業典禮？然而，前述學者認為，以蘇美語寫成之師生間「學校對話短文集」(School Dialogues) 中，可以推論出許多幽默有趣之學校生活，此實係文士學校之直接產物，蓋從此短文中，吾人可直接得知學生與其師長、輔導老師、父親或學生間彼此之對話。對話之焦點總難免不脫遲到、懶惰、成績

³³ 李海峰，《古代近東文明》，66。

³⁴ Charpin, Dominique, *Reading and Writing in Babylon*, translated by Jane Marie Tod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3-64.

³⁵ 此字通常用以稱呼工匠 (Craftsman)，很顯然的，在此學校教育系統下，寫作似乎被視為是一種工藝 (craft)。

³⁶ David M. Carr, *Writing on the Tablet of the Heart-Origins of Scripture and Literature* (Oxford, 2005), 20.

³⁷ 李海峰，《古代近東文明》，66。

³⁸ 伯特曼，《探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458-459。

合格與否等話題³⁹。

此外，Cohen 在研究法國考古隊由幼發拉底河上游古城埃瑪爾城（Emar）挖掘到之學校遺址大量泥板文獻後，發現於泥板末端四十名文士之落款中約有十二位係學校之教師。Cohen 並以其中一位埃瑪爾城貴族祖巴拉家族（Zu-Ba'la family）之例子為例，論到在該遺址所發掘之一棟大型建物，由其外觀及其室內結構並於該建物裡發掘之信件及時效性商業文件之署名觀察，此建物係屬祖巴拉之家業，而於此建築物裡尚發掘許多學校文本資料及祖巴拉家庭中之學生練習泥板；並且存有關於禮儀之圖書館或資料庫複寫本，以及先於祖巴拉家庭之前面數個朝代，由敘利亞文士依敘利亞早期傳統所寫的米索不達米亞地區學術性質文獻。由 Cohen 之研究觀察，吾人可得知此建物曾從事著學校教育活動，其中曾存有數位教師及學生，而此些教師與學生之關係相當程度係關乎一個家庭裡的事（a family affair for the most part），亦即師生之間應屬親屬關係；此即有如古巴比倫時期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文士學校一般，在私人家庭裡，有著相當於小型學校之結構，僅有數位老師及學生參與其中⁴⁰。

4. 學校教職人員（School Personnel）

在學校裡，除前述學校之老師、學生外，尚有老師之助手，稱為助理老師，其職責乃在於寫出新的泥版以供學生複寫之用，並檢查學生之複寫及背誦狀況。此外，由 Kramer 所撰名為”School days”的 Eduba 文本裡，亦曾提及一群在學校擔崗之公務人員，如院子裡的監工、紀錄學生出勤紀錄者、制定學生守則者、維持課堂秩序者、管理學生出入校園人員等等，雖然其彼此間地位高低無從得知，但其等均在崗位上各司其職⁴¹。

5. 課程設置（Curriculum）

(1) 教育階段暨課程安排（The Phases of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古代近東蘇美之學校教育課程設置最主要之目的，乃在於教導學生寫作之技能與計數之本領，課程大略劃分為三種，分別是基礎課（語言課）、專業技術課以及文學創作課。依照學者 Waetzoldt 的觀察研究，於基礎課學生必須學習詞語表（lexical lists）以及相當簡單之文本如箴言、謎語及文學摘錄。許多學生礙

³⁹ Yoram Cohen and Sivan Keda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Two Cases Studi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neiform Culture*, ed. by Karen Radner and Eleanor Robson (Oxford, 2011), 229.

⁴⁰ Cohen and Keda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Two Cases Studies,” 233-234.

⁴¹ Veldhuis, “The Cuneiform Tablet as an Educational Tool,” 11-12. 另參 Veldhuis, *Elementary Education at Nippur*, 24-25. 李海峰，《古代近東文明》，66。

於經濟上考量，大多僅學習基礎課程（Elementary Education）⁴²。語言課是一門最基礎之課程，主要教授蘇美語言，分有單詞課及文法課，為便於學生記憶及複寫，老師們將有聯繫之單詞和短語進行分類，此些分類逐漸累積成固定模式，最後形成通用教科書。在操作上，學生被教導學會辨識基本楔形文字字義，並借助筆尖鈍挫之蘆葦筆在泥板上創出文字；此外，學生須學會和泥、塑形及磨平預備書寫用之泥板；並且亦需學習如何燒製經過雕刻之泥板，以便永久保存之。原則上，掌握楔形文字歷時經年，蓋因書寫相當繁複，要精通書寫並非容易，多需耗費千萬小時之專業訓練，始能從使用過之千萬個文字及文字組合中，進行辨識抄寫⁴³。

在進階之教育階段，課程多涉及學生之讀寫技巧及計數，讀寫技巧之任務包含保持商業紀錄、書寫及閱讀契約、寫信、發送軍事情報、背誦禱詞與咒語，以及理解醫學文章等等。計數之任務則包含測量土地地皮及產量、決定稅收、提供軍隊戰鬥給養、計算建造一座攻城專用梯之土方數量、建造一座新宮殿所需之磚塊數量，或是進行天體運算等。最後，學生亦需在此階段掌握天文學、地理學、礦物學、動物學、植物學、醫學、工程及建築方面之專業術語⁴⁴。通常單就前述二階段即需耗時約八至十年不等，如學童入學時僅五、六來歲，畢業時已然約莫十五歲上下。

對於高等學生而言，即漸漸進入最後之教育階段，亦即文學創作階段。通常在此時期之學生文士，將在官僚系統裡成為專業文士之助理，並在此專業文士身旁以學徒身份學習數年時間。依此方式，學生文士將可學到未來職場上行政管理細項所需用之特質。在此階段結束後，文士畢業時已約莫十八來歲，可說已成為得獨當一面之專業文士⁴⁵。在學生學習文學創作的實際操作上，學生一面抄寫、模仿及研究過往之文學作品；二來學習新的文學創作。通常在基礎課程轉換至較高階課程階段，用以供學生抄寫之作品係被學者稱為”The Tetrad”的作品集，當中包含 Lipit-Eshtar B、Iddin-Dagan B、Enlil-bani A、Nisaba A 等作品。在進階教育的第二階段（最高階），學生學習抄寫被近代學者稱為”The Decad”之作品集，其中包含 Šulgi A、Lipit-Eshtar A、Song of the Hoe、Inana B、Enlil A、Kesh Temple Hymn、Enki’s Journey to Nippur、Nungal A 以及 Gilgamesh and Huwawa, Version A 等作品集。前述作品多為慶祝神靈和英雄光輝事蹟之神話或史詩，當中亦有歌頌

⁴² Soldt, “Babylonian Lexical, Religious and Literary Texts and Scribal Education at Ugari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alphabetic literary texts,” 182.

⁴³ 伯特曼，《探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459-460。

⁴⁴ 伯特曼，《探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460。

⁴⁵ Soldt, “Babylonian Lexical, Religious and Literary Texts and Scribal Education at Ugari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alphabetic literary texts,” 182.

神及國王之讚美詩及愛情詩、祈禱詞，也有哀泣蘇美城市滅亡之輓歌，當中亦不乏教諭文學、智慧文學，包含寓言及格言等⁴⁶。

(2) 教學方法 (Educational Tools)

關於蘇美學校裡的教學方法和技巧，泥板上記載不多。學生到校之後，首先複寫前一天所學之泥板資料，助理老師早已預備一新泥板資料，供學生於當天複寫和學習。最後老師與助理老師檢查學生之泥板是否書寫有誤。誠如一則亞述巴尼帕(Assurbanipal)之泥板所言：「那布(Nabu)和其配偶塔什米頓(Tashmetum)給了他(文士)『偉大的耳朵』，使他理解和掌握楔形文字之印跡。」，顯示記憶誠然在此學習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此外，老師與助理老師均會做部分學術報告，以增加學生見識⁴⁷。

為確定學生能抄寫文字及理解所抄內容之意思，當下老師會採取背誦及書寫之法。有時，老師會給予學生更高階功課，要求寫出或讀出更長之文章或經過推廣之數學計算。在整套學習過程中，對新詞語之記憶與對數學程序之理解係學習重點。在適當時候，老師們會解說教材中之內容，並於每隔一段時間進行相關測試。對於更高程度之學生而言，有時老師會穿插關於學校之幽默故事，以求緩和課程之枯燥；例如某些泥板曾記述到，一名學生與另名較年長學生爭辯誰更聰明，或父親埋怨不務正業之子行為不當等幽默趣事⁴⁸。

另外，在Kramer的研究中，曾於一則泥板文本中觀察到在早期蘇美之學校體制內，於學生紀律方面似乎採行相當嚴格之態度，儘管老師仍會採用鼓勵、表揚之方式勉勵學生之學習，然而主要仍用體罰之方式以管教學生。此些類型泥板為數不少，其記載內容實令人為之莞爾，大意約莫如下：

「我進入教室並坐下，我的老師讀完我的泥板，

他說：『這缺少了幾個字！』就用藤條抽我。

負責管理的人說：『為何你未經我允許就開口？』就用藤條抽我。

負責課堂秩序的人說：『為何你未經我允許就站起來？』就用藤條抽我。

負責管理學生出入之人說：『為何你未經我允許就出去？』就用藤條抽我。

負責監管啤酒壺之人說：『為何你未經我允許就取酒？』就用藤條抽我。

教導蘇美語老師說：『你為何說亞喀得語？』就用藤條抽我。

⁴⁶ Robson, "The Tablet House: A Scribal School in Old Babylonian Nippur," 53. 李海峰，《古代近東文明》，66。

⁴⁷ 李海峰，《古代近東文明》，67。

⁴⁸ 伯特曼，《探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464。

我的老師說：『你的寫作不好。』就用藤條抽我。」⁴⁹

關於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地區教育方法之研究，學者 Konrad Volk 在觀察大量泥板後，針對老師在學校教育可能引用之教學方式，得出以下約七種方法，分別是：讚美學生、為學生樹立榜樣、鼓勵適當競爭、以對社會之認同與繁榮引導學生、訓誡及吸引力、擊打、監禁⁵⁰。

6. 教學材料 (Materials)

Veldhuis 曾以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古城尼普爾出土之學生練習泥板為範例，嘗試透過將泥板分類，以便於窺見學校教育課程中使用泥板為教學內容之全貌。在尼普爾，學生接受文士教育的第一階段必須複寫如下之清單：符號清單 (lists of signs)、字詞清單 (lists of words)、貯存詞組之清單 (lists of stock phrases)、數學及度量衡清單 (mathematical and metrological lists)⁵¹。

在學生的各式練習泥板中，發現確實存有不同之泥板格式及泥板內容。因此，練習用泥板的格式將告訴吾人該類泥板在教育中之作用何在。泥板通常分為後述五種類型，分別是類型一之大型複數欄位泥板 (Large multi-columned tablets)、類型二之大型師生複寫泥板 (Large teacher-student copies, 通常稱為 large tablet)、類型三之小型單欄泥板 (Small one-columned tablets)、類型四之圓形泥板 (Round tablets, 通常稱為 buns 或 lentils)，以及最後一種類型五之泥板，內容幾乎等同於類型一，又稱為 Prisms⁵²。

(二) 學校與神廟 (Schools and the Temple)

在喀西特王朝 (Kassite Period) 末期以降，文士之學校教育通常在神廟的學校裡舉行。一份由烏魯克 (Uruk) 出土之第六世紀文本，當中確實含有證據顯示神廟確實被用以作為文士之訓練中心；並且於 1970 年在巴比倫的拿布 (Nabu)

⁴⁹ Tinney, "Texts, Tablets, and Teachings-Scribal Education in Nippur and Ur," 48. 李海峰,《古代近東文明》, 66。此則泥板英文譯文如下：

「I went in and sat down, and my teacher read my tablet. He said "There's something missing!" And he caned me.

One of the people in charge said "Why did you open your mouth without my permission?" And he caned me.

The one in charge of rules said "Why did you get up without my permission?" And he caned me.

The gatekeeper said "Why are you going out without my permission?" And he caned me.

The keeper of the beer jug said "Why did you get some without my permission?" And he caned me.

The Sumerian teacher said "Why did you speak Akkadian?" And he caned me.

My teacher said "Your hand(writing) is no good!" And he caned me.」

⁵⁰ Volk, "Methoden altmesopotamischer Erziehung nach Quellen der altbabylonischen Zeit," 183-216.

⁵¹ Veldhuis, "The Cuneiform Tablet as an Educational Tool," 17.

⁵² Veldhuis, "The Cuneiform Tablet as an Educational Tool," 17. Robson, "The Tablet House: A Scribal School in Old Babylonian Nippur," 46.

城所發掘大約 1500 件學生之練習泥板上，均顯示了神廟所扮演之重要的教育角色。通常文士之教學會在神廟的研討室 (workshop, 或稱為 bīt mummu) 裡進行，因而此處之文士學徒自稱為「神廟研討室之子」(son of the temple workshop)。學生們甚常將他們的練習泥板作品獻給神廟裡的神，或在宗教慶典的場合裡奉獻他們之作品以表彰他們的虔誠。在拿布神 (Nabu, 寫作之神) 的幫助下，學生花費數年時間在神廟研討室裡學習，為要成為有造詣的文士⁵³。

學生受裝備成為學者後，其身份可以說是是宗教上之專家，因而神廟不僅是他們的主要雇主，亦是他們自然的產出之地。學者可以說與神廟之研討室密切連結。學者終其一生，神廟之研討室與圖書館對其而言，均是相當重要之機構。實質上，在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因著神廟存有圖書館之故，神廟乃是學術與學習之中心；神廟亦提供學者練習其專業技能之適當機會⁵⁴。

(三) 文士之出路 (Scribal Careers)

於經年累月之學校教育受教過程後，文士們依其所受教育時間之長短及學習領域，可能選擇不同之就業方向。如果僅完成初階之教育階段者，可能會在行政管理領域裡尋得一職份，畢竟於職場上總有辦事員及一般文士 (clerks and scribes) 之需求與職缺。其次，他們亦可能進入私人產業 (private estates) 之服務領域及一般商家 (merchant houses)；亦有部分可能尋求成為公職文士 (public scribes)⁵⁵。

如果文士經歷第二階段之受教育過程者，其未來方向較難預測。專業上之學習並不保證文士會自動地成為該專業領域之實踐者。如果是以宗教為其主要專業，通常神廟會是此些人之雇主；而大部份主前一千年左右之巴比倫及亞述之學者群，實際上確實附屬於神廟或與神廟體制相關。例如，烏魯克 (Uruk) 富有聲望之文士家庭，即與烏魯克之神廟有相當程度之連結。部分專業領域如驅邪者、禮儀歌唱者、先見者或占星家等學者群，雖屬於神職人員，然而他們並非祭司，僅是從屬於神廟大祭司或祭司群下之一群學術專門知識人員。從屬於神廟之學者及前述之神職人員在神廟內部的職缺並不多見，此群學者之產出僅係與神廟相關，而其收入來源並不倚賴神廟。甚至，學者群僅部分時間從事與神廟相關之學術研究，其餘時間則另尋其他收入來源。原則上，在當代，至少文士確實是收入來源之保證，在就業市場上，確實總是存在對進階教育技藝之足夠需求⁵⁶。

⁵³ Toorn, *Scribal Culture-and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56.

⁵⁴ Toorn, *Scribal Culture-and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63-64.

⁵⁵ Toorn, *Scribal Culture-and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59-62.

⁵⁶ Toorn, *Scribal Culture-and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59-62.

有些頗具聲譽及名望之專家，可能於王室之法庭（Royal Court）裡獲取一職份。儘管此些王室法庭之文士只有部分是學者，然因此些文士與亞述諸王間，存有大量之通信紀錄，吾人可知此些文士確實理解著一些顯著之米索不達米亞學者之文學著述。此些法庭文士猶如法庭之顧問，並且亦擔負著國家禮儀與身為王室家族成員家庭教師之責任。此些法庭文士（Royal scribes）所從事之活動範圍甚廣，例如他們得以為王之健康進言、可以建議軍事策略、為神廟事務進言等，其可向王進言之範圍幾乎無所限制。在王室之往來信件中，吾人亦可察覺此些王室學者間，總存在相當程度之競爭，他們於信裡描述著自己之豐功偉業，卻貶低對手之學術才智，此均足見王廷之文士學者地位之相當不穩。存在於新亞述王國時期之一案例，一名為 Urad-Gula 之法庭文士，曾侍奉過 Sennacherib(704~681)、Esarhaddon(680~627) 以及 Assurbanipal(668~627) 等新亞述帝國諸王。身為王室驅邪者 Adad-šumu-ušur 之後代，Urad-Gula 看起來似乎注定前程似錦。於 Sennacherib 在位期間，他被任命為開業醫師之主要代表；在 Esarhaddon 在位期間，他變成王室法庭之驅邪者；及至 Assurbanipal 承繼王位之後，Urad-Gula 突然受到降級。即便 Urad-Gula 父子多次去信予新王，陳述自己向來之忠誠，卻始終未能改變新王之策略⁵⁷。

文士之就業途徑除前述幾種以外，也有可能成為翻譯者。當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地區諸王企圖擴張其領土時，翻譯者之需求便因應而生。文士因著素常紮實之語言裝備訓練，便理所當然承接了此職分。在主前一千年之後，翻譯者之需求量甚至大增，尤其是在亞契米尼王國（the Achaemenid period）時期臻至巔峰⁵⁸。

（四） 比較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地區與新巴比倫及新亞述王國之學校教育

1. 課程內容之差異（Differences of Curriculum）

針對古代近東之學校教育相當有研究之女性學者 Petra D. Gesche，曾就主前一千年巴比倫之學校課程設置進行深度考察並撰述成書 *Schulunterricht in Babylonien im ersten Jahrtausend v. Chr.*⁵⁹。其研究二十世紀八零年代由尼普爾出土之十一塊學生練習泥板，得出關乎新巴比倫王國時期學校教育課程設置之相關內容。在其書 D 與 E 章節中，Gesche 以泥板類型分析、練習泥板內容分析、練習泥板末端落款分析等方式，重建新巴比倫王國暨晚期巴比倫王國時期之課程設

⁵⁷ Torr, *Scribal Culture and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59-62.

⁵⁸ Pearce, "The Scribes and Scholar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2274.

⁵⁹ Petra D. Gesche, *Schulunterricht in Babylonien im ersten Jahrtausend v. Chr.*, *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ment* 275 (Münster: Ugarit-Verlag, 2001), 21-24

置內容態樣。作者本身依照泥板之物理性特徵，非常熟諳學校教育階段之區辨，例如泥板類型一之訓練始終較之泥板類型二更為基礎，並且缺乏變化。泥板類型一包含由音節表 S^a、字彙表 S^b 所做之摘錄...等等，作者確實地根據文本內容及泥板物理性之特徵區辨了許多泥板類型一及類型二之細項。除了前述區辨，作者針對新巴比倫王國暨晚期巴比倫王國之泥板及文本，亦進行相當多之討論⁶⁰。故此，吾人似乎可觀察到學校教育之課程設置，演變至新巴比倫暨晚期巴比倫國時期，其課程設置模式似乎雷同，然於內容之細項卻容有差異及變化。換言之，不同課程階段使用何類型之課程內容，似乎容有變化，並非一成不變⁶¹。

另於新亞述王國時期，最著名之學生練習泥板大多出土自亞述之尼尼微城，亦即新亞述王國時期之亞述巴尼帕王所創設最大、最著名之泥板圖書館所在之處，因而學生練習泥板勉強存留下來，然迄今此些泥板資訊尚未得到系統性之評估。關於新亞述王國時期寫作訓練之研究，僅限於培訓進階教育優秀之學生。作為新亞述王國時期教育上之重要見證者，實係一種於尼尼微稱作「交叉格式」(Cross-format)之泥板，其中一面記載重點，另一面則是所謂「實用尼尼微字彙」(Practical Vocabulary of Nineveh)之摘錄。除此泥板之變革外，新亞述王國時期之課程設置，多與新巴比倫王國時期無異，唯一可見之差異，僅係此作為摘錄之泥板的格式與新巴比倫王國時期不同而已⁶²。

2. 書寫材料之差異 (Tools Used for Writing)

古代近東之文士，多使用泥板及及蘆葦筆 (clay tablet and reed stylus) 來進行寫作之任務，此二種材料均可於米索不達米亞河邊尋見。然而在新亞述王國時期，因著宮廷牆面雕刻之盛行，例如於 Adad-nirari 三世、Tiglath-Pileser 三世、以及 Sennacherib 等幾位新亞述王國之國王時期，文士需要完成其任務。從尼尼微城出土的牆畫甚至描繪了二位文士紀錄了戰爭的損壞以及敵人死傷之數量。亞蘭的文士手持的是筆以及蒲草紙，其餘的文士則手持一個有鏈子、其上覆蓋一層蠟的木板，或是楔型泥板及蘆葦筆⁶³。

除前述書寫材料之變化外，包含泥板之燒製過程也在不同時代裡不斷改良其耐用程度。因著大型泥板燒製之不易，漸漸泥板轉變成小型。也因著長篇大論的內容需要壓縮在一塊小型的泥板裡時，字體越刻越小，隨之發展出來的便是放大鏡。放大鏡的出土係在尼尼微城，因而在亞述王國時期文士之閱讀上曾使用放

⁶⁰ Niek Veldhuis, "On the Curriculum of the Neo-Babylonian Schoo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3:3 (2003), 627-633.

⁶¹ Veldhuis, "On the Curriculum of the Neo-Babylonian School," 627-633.

⁶² Gesche, *Schulunterricht in Babylonien im ersten Jahrtausend v. Chr.*, 23-24.

⁶³ Pearce, "The Scribes and Scholar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2266-2267.

大鏡受到證實。雖然有放大鏡的產出，然而希望楔型泥板精簡短小而縮小閱讀張力，卻是學生的需求，例如在新亞述王國時期，前述精簡短小之泥板內容即係亞述巴尼帕王在戶外時之學習⁶⁴。

3. 學校規模之變化 (Scale of Schooling / Eduba)

在古之巴比倫與亞述，通常圖書館係立於神廟之內，而圖書館幾乎亦形同神廟內部之資料庫，因而複寫一份文本被視作是虔誠之工作，得以將文士帶向天堂之祝福，甚至洗滌其罪。學校必須依附於圖書館，並且二者泰半多為毗連之建築物。此亦得以解釋，為何學校之練習泥板、閱讀泥板及其他學術文學著作之所以儲存於尼尼微城圖書館之理由⁶⁵。

晚期的學校已漸漸發展成為一大學。在巴比倫周圍之城市 Borsippa，其大學之圖書館乃建於尼坡山 (Nebo) 的神廟，而大學即立於同處；並且由大英博物館尚存之該處的一片巴比倫醫學工作殘簡得知，該大學應為一所醫學學校⁶⁶。

此外，因著新亞述王國時期亞述巴尼帕王對學術活動之高度興趣，使亞述巴尼帕王在尼尼微城創設最大型、最著名之泥板圖書館，相對也使得學校之規模擴張，泥板書之藏書量豐碩許多。曾有一文士寫信予亞述巴尼帕王，信中指出該王親自參與選擇即將收納進泥板圖書館之各種泥板書；而於一封亞述巴尼帕王寫給一文士的書信中也指出，王要求該名文士於各藏書室及巴比倫之拿布神廟中尋找某份王所欲收納進圖書館之泥板。另於新巴比倫王國時期，最後一位王拿波尼德 (Nabonidus) 以喜愛古物著稱；在他企圖重建關於敬奉月神辛之禮儀時，他向較早期之古碑及古代泥板尋求適合之程序，傾向收集古物，藏書規模想必亦不可小覷⁶⁷。

4. 受教育機會之普及 (Opportunities of Schooling)

在古巴比倫與古亞述時期，學校可以是富庶階級之專利，僅限於上層階級之家庭或學童得以進入學校就學。學習可以說是文士之特權，文士在政府公職中實在佔有一席之地；且文士在當代所面臨之其他人泰半均是未受教育者。然在新巴比倫王國時期，似乎學校教育已漸漸開放予非上層階級之學生，文士不再是專有之特權階級，因而當代亦出現駕駛灌溉車之子、最貧窮家庭出身之子或屬社群最低下階層之子，均有可能複寫一份「創造史詩」的一部分，亦有可能為了自身

⁶⁴ A.H. Sayce, *Babylonians and Assyrians-Life and Custom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9), 43-44.

⁶⁵ Sayce, *Babylonians and Assyrians-Life and Customs*, 46.

⁶⁶ Sayce, *Babylonians and Assyrians-Life and Customs*, 46.

⁶⁷ Pearce, "The Scribes and Scholar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2276-2277.

之靈魂美好，而將此複寫本存進 Borsippa 之圖書館。再者，新巴比倫王國及新亞述王國時期之契約泥板，確實均顯示奴隸群們也會讀和寫。新亞述王國時期之亞述巴尼帕王喜愛文學創作之企圖心，毫無疑問地使得教育之機會大開其門⁶⁸。

5. 學徒契約之產生 (Teacher-Student Apprenticeship)

有別於古代近東之米索不達米亞，尼布甲尼撒和拿坡尼德是新巴比倫王國時期最著名之二位王，建樹成績斐然，不但將工匠、藝術家、勞工帶往首都，並且於食物不足時配給與糧食，以養活此些低階層人民。在此太平盛世，部分與政治關係密切、富庶並且擁有權勢之巴比倫商賈家庭，於焉產生；在當時，其中一素負盛名之商賈家庭即為巴比倫之「伊吉比商家 (Egibi family)」。此類家庭出現於主前七世紀末葉之時，通常是二代一同管理購買土地、奴隸，一同服務於王室之家庭與神廟。伊吉比商家更是參與當時農業貿易，財政上投資企業與工業。因而，在此商家背景下，即便發現數量龐大之學徒楔形文字契約，亦無需感到訝異。在 Sippar 的 Ebabbar 神廟之資料庫與各大城市私人家庭之資料庫中，發現約有三十五份法律上之學徒契約出土，其中載有學徒學習貿易之條款與情況⁶⁹。

前述之學徒契約，實與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學校教育裡之師生關係截然不同。相對於新巴比倫王國及新亞述王國之多以成立契約方式收受學徒，古代米索不達米亞之師生關係並非採性訂立契約方式。新巴比倫王國時期之學徒契約基本上有一定格式，文士之學習過程大致上即在學習如何草擬此類學徒契約⁷⁰。

(五) 結論 (Conclusion)

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地區之學校教育圖像，歷經眾多學者群按著學校泥板文本之文學分析，以及考古證據之分析後，漸漸重建還原當代之 Eduba 運作模式。雖然在古代米索不達米亞歷史中之黑暗時期，Eduba 亦未曾倖存下來；然而，學校教育係文化傳承之核心機制，即便短期間消逝，後人亦會設法重起爐灶，延續前人之建樹，繼續前進。

因著學校在古代近東與神廟之密切結合，學校之規模由小趨大；神廟裏之圖書館與資料庫是成千上萬塊泥板文本得以存留之救贖機制。古代近東之米索不達米亞文化因著良好之保存機制而得以傳承延續下去，吾人得以見到 Eduba 由古巴比倫時期之盛行，其設置紮實嚴謹之課程內容及密切之師生互動關係等，造就了無數歷代文士達至裝備就職相關專業能力、維護文明之持久、並培養更美

⁶⁸ Sayce, *Babylonians and Assyrians-Life and Customs*, 46-47.

⁶⁹ Cohen and Keda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Two Cases Studies," 238-239.

⁷⁰ Cohen and Keda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Two Cases Studies," 238-239.

好之人性之高尚目標。再者，也因著 Eduba 結合神廟及圖書館之良好保存功能，使各種泥板文本及學生練習泥板文獻等文化資產得以代代流傳，即便進入不同世代之學校教育，莘莘學子們仍有機會窺見並研習往昔之學校教育課程型態及內容。

觀察新巴比倫及新亞述王國時期之學校教育，似乎均走向改善往昔缺失之方向。例如其課程內容編排儘管大致維持往昔之輪廓，卻又容有細項之活潑變化；其書寫材料因時代變遷而更加簡化並輕省，相當程度減輕了學生學習上之負擔；學校規模因與神廟及圖書館之密切連繫而逐漸擴大，並且此舉亦帶來擴大平民階層受教育之機會；經濟局勢之變化亦使得學習型態與機會增加，學徒制契約之出現實係因應當代社會上之需求而生。

值得注意者，新亞述王國時期亞述巴尼帕王對學術之哀情並建造最大型泥板圖書館，更是維護與保存古代近東米索不達米亞文化之大功臣，亦是使新亞述王國時期之學校教育得以鞏固並茁壯之因。縱使在亞述巴尼帕王之後，便終至戰爭連年、臣民百姓無暇顧及文化資產之地步，然而亞述巴尼帕王於當代關乎學校教育上之建樹，確實是日後其學校教育仍有機會得以重建與還原之契機。

參考書目

- Carr, David M.**, *Writing on the Tablet of the Heart-Origins of Scripture and Literature* (Oxford, 2005).
- Civil, M.**, “Education in Mesopotamia”,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II* (New York, 1992), 301-305.
- Dominique, Charpin**, *Reading and Writing in Babylon*, translated by Jane Marie Todd (Harvard, 2010), 63-64.
- George, A.R.**, *Rezensionen*,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50 (2003/2004), 403-406.
- Gesche, Petra D.**, *Schulunterricht in Babylonien im ersten Jahrtausend v. Chr.* (Ugarit-Verlag, 2001), 21-24.
- Jamieson-Drake, David W.**, *Scribes and Schools in Monarchic Judah-A Socio-Archeological Approach* (Almond, 1999).
- Kramer, Samuel Noah**, "Schooldays: A Sumerian Composition Relating to the Education of a Scrib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9:4 (1949), 199-215.
- Landsberger, Benno**, “scribal concepts of education”, *City Invincible: A Symposium on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Held at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cember 4-7, 1958), Edited by Carl H. Kraeling & Robert McC. Adams.
- Pearce, Laurie E.**, “The Scribes and Scholar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CANE* 4, 2265.
- Rollston, Christopher A.**,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the World of Ancient Israel-Epigraphic Evidence from the Iron Age* (SBL, 2010).
- Seibert, Eric A.**, *Subversive Scribes and the Solomonic Narrative-A Reading of 1 Kings 1-11* (T & T Clark, 2006), 50-51.
- Sjöberg, A.W.**, *The Old Babylonian Eduba*, *FS Th. Jacobson*, (AS 20, 1975), 159-179.
- Tinney, Steve**, *Texts, Tablets, and Teachings-Scribal Education in Nippur and Ur, Expedition*, Vol.40:2 (1998), 40.
- Pearce, Laurie E.**, *The Scribes and Scholar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CANE IV*,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1995), 2265.
- Robson, Eleanor**, “The Tablet House: A Scribal School in Old Babylonian Nippur.”,

Revue d'assyriologie et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Vol.93 (2001), 39-66.

Sayce, A.H., Babylonians and Assyrians-Life and Customs (New York, 1990), 43-44.

Soldt, W.H.van., Babylonian Lexical, Religious and Literary Texts and Scribal Education at Ugari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alphabetic literary texts (Dietrich-Loretz, 1995), 180.

Toorn, Karel Van Der, Scribal Culture-and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Harvard, 2007), 56.

Veldhuise, N., Elementary Education at Nippur: The Lists of Trees and Wooden Objects, Ph.D. diss. (Groningen, 1997), 24-25.

Veldhuis, Niek, On the Curriculum of the Neo-Babylonian Schoo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23:3 (2003), 627-633.

Veldhuis, Niek, The Cuneiform Tablet as an Educational Tool, DS-NELL Vol.2 (1996), 11.

Volk, Konrad, "Methoden altmesopotamischer Erziehung nach Quellen der altbabylonischen Zeit", Saeculum 47 (1996), 178-216.

Waetzoldt, H., Der Schreiber (wie Anm. 9), 33.

Yoram Cohen and Sivan Keda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Two Cases Studi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neiform Culture, ed by Karen Radner and Eleanor Robson (Oxford, 2011), 229.

斯蒂芬·伯特曼。《探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李海峰。《古代近東文明》。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